

## 网络新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 邱吉 杨秀婷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网络新技术使人类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对青年的认知与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为青年提供“共在共时”的信息场域,使青年获得整体认知世界的可能;引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丰富了青年解读世界的多维价值取向;为青年释放创新创造潜能搭建新的人文空间,提高了青年改造世界的积极性,最终使青年的价值观呈现出个性与包容并存、开拓与创新统一的特征。同时,网络新技术对青年的价值观形成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就技术本身而言,它内在的资本逻辑会消解青年的价值理性,“去中心化”特质易使青年陷入价值迷茫;就技术应用而言,青年过度沉迷虚拟现实极易导致“技术崇拜”的偏见。教育必须发挥新技术在主导价值观嵌入、思想引领阵地、人文精神引导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网络新技术 青年价值观 认知世界 价值理性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4.007

价值观形成是主体接收、认知、整合外界信息,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态度倾向并外化于行,最终形成固定看法和观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认知内化、取向生成,再到实践落地的价值闭环。因此,“人的价值观念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中形成的”<sup>[1]</sup>,受社会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载体的网络新技术(以下简称“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青年的生活环境。作为使用新技术的主力军,青年群体具有好奇心与适应力强、观念前卫等特点,这决定了新技术造就的社会变化最先影响青年的价值观形成过程。有研究发现,青年与技术的特殊亲和关系使青年形成“技术大于自然”的认知特征,其认知能力和信息量在新技术时代飞速增长,但又极易因对技术过分依赖而丧失“自然能力”<sup>[2]</sup>。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赋权具有双重影响,既能提升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及效能,也存在消解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困境<sup>[3]</sup>。可见,随着运用范围扩大、使用程度加深,新技术能够赋能于青年,使他们的价值观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性。为此,教育需要重新审视新技术如何改变青年认知世界、解读世界与塑造世界的观念,继而在技术赋能的条件下促

收稿日期:2021-05-06

作者简介:邱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职业精神;

杨秀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网络空间下首都高校学生价值观状况研究”(课题编号:19CJJB01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尚化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进价值观教育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 一、新技术打造“共在共时”场域,深化青年对世界的整体认知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青年的主要活动场域,是决定其价值观走向的重要前提。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9岁以下的网民群体占中国网民的54.9%,学生是使用网络最多的群体,占比为21%,表明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群体已成为新技术的使用主力。由此,“万物互联”“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建构的信息场域,深刻改变着青年的认知方式,为青年整体把握现实世界提供了可能。

### (一)“万物互联”使青年延伸感知能力,全面具象地认知世界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连接起来,使青年突破生理肢体的感知局限,将认知拓展至技术所覆盖的范围,获得了认知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万物互联”的新技术为青年认识世界提供了“共在”场域。“物联网也是‘联网’概念的扩展,从互联网的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联网以及其中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网,扩展到了物与物之间的联网,使‘网络’成为沟通人、物和机器之间的桥梁。”<sup>[4]</sup>以物联网作为动力,一切事物的来源去向、要素成分都在虚拟空间实现连接。虚拟化的、可被反复使用、随时间变化不断更新的物联,超越了时空局限与物质条件限制,将现实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呈现为人能够认知的对象性存在,使整个世界成为青年生活、交往与实践的“共在”空间。“年青一代通过Skype在全球课堂学习,在Facebook上与全世界的同伴们进行社交,在Twitter上与亿万同龄人聊天,在互联网上在线分享家庭、服装乃至一切事物,在能源互联网上跨州生产和共享绿色电力,在不断发展的物联网上共享汽车、自行车和公共交通。”<sup>[5]</sup>无处不在的信息传感器将青年生活的各个领域联合为一个整体,使他们充分感知从自我辐射至全世界的生活环境,即时、直接获得所有事物的信息。互联网受运算与存储限制,其承载的简化信息使青年对世界的形象止步于简单轮廓;而物联网将世界万物通过具象样态呈现在青年面前,使他们能够全面、系统、具体地在认知层面构建世界形象。

### (二)“人工智能”使青年在与世界实时交互中形成系统性认知

“人工智能”与网络结合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交互方式。具有拟人化、智能化特征的软件或机器成为青年日常交流的常用工具,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建立起一座实时沟通的数字化桥梁,促使他们从系统角度重新认识“二元世界”的关系。

“人工智能”使人机关系从搜索式的单向交互转向对话式的双向交互,促使青年深切感受“世界联为一体”的真实存在。计算机的产生首先带来了以DOS系统、图标、键盘等为载体的人机交互关系,这一关系是以人为主导的单向互动,在更大意义上是被动地等待人们搜寻信息的技术工具。迭代后的“人工智能”技术则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人的智能、表达甚至心理情绪加载到机器上,使其具有了人性与“物格”,可以通过语音、触控、手势和体感等方式与青年实现“共时”交互。青年是好奇心、适应力与学习能力最强的群体,可以迅速适应与掌握“人工智能”的运用,如小度、Siri、天猫精灵等智能机器与智能软件已经成为当前青年交流与咨询的常用对象,淘宝、百度、京东等操作平台均已植入智能化推送机制,主动向青年呈现他们喜欢的各种产品。青年逐渐习惯从智能技术中获取信息、求解问题以及挥霍闲暇时光,这一切必然引起他们认知思维的变化。青年清楚地意识到,“自我”同处于现实和虚拟共存的“二元世界”中,现实与虚拟交汇的多维时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的关系定义颠覆了以往静止、孤立、单纯实体性的认知,促进青年以系统动态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二元世界”的存在和

发展。

### (三)“虚拟现实”使青年从世界的“观察者”转变为“体认者”

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依据现实场景建构出声图文一体化的虚拟环境,让青年生活在曾经见过或未曾见过的、允许其自由观察与操作的“人工”世界中,虚拟实践逐渐成为青年认知世界的主要形式。

“虚拟现实”技术为青年建构了一个逼真性与沉浸性的拟态环境,使他们的情感体验得到充分满足。新兴虚拟现实技术使参与者处于一个身临其境、具有完善交互能力,同时能够启发构思的信息环境中<sup>[6]</sup>。技术不再是单纯文字、图像或视频的直观呈现,而是综合仿真、场景生成、人工智能、传感器等多种高新技术构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逼真环境,使青年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进行跨时空交互,产生实时“在场”的沉浸感。“‘沉浸’意味着主体对身体感觉、知觉的完全依赖性,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身体知觉的人工化,使身体所感知的实际上是经过了预处理的虚拟的影像和感觉,是预先建构好的世界在人工知觉中的展开。”<sup>[7]</sup>如当前流行的“虚拟旅游”,将现实景点搬到虚拟空间,青年足不出户即可沉浸于风光美景,通过视听观赏获得与真实旅游相似的愉悦体验。青年借助拟态环境的娱乐属性,将自己从工作、学业、生活等压力中解放出来,在沉浸体验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情感的满足。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拟像的虚拟世界成为立体的仿真世界,青年已有的虚拟性意识再度翻转为“现实性”意识,原有对虚拟世界产生的机械感、缥缈感转化为全景感、真实感。虚拟现实通过模拟人的亲身体验实现感知,这促使青年不再站在“观察者”的位置看世界,而是以“存在者”角色真实地体认世界,自由地获取在现实中难以获取的诸多信息,极大地扩展了认知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他们在意识层面建构多维立体的世界。

## 二、新技术引发社会深刻变革,丰富了青年解读世界的价值取向维度

青年以不同的态度表达对世界万物的认知感受,最终内化为他们阐释和解读世界的价值取向。伴随着新技术对社会环境的不断侵入,网络已然成为青年社会化连续体中的重要一环,它在社会不同领域所引发的深刻变革,影响着青年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推动他们从不同维度解读世界。

### (一)共享生产模式推动青年以个性化方式解读世界面貌

新技术搭建的数字经济平台实现了生产、流通、交换与消费的时空一体化,推动青年积极参与数字化的共享生产模式,充分激发他们以个性化风格描绘世界的热情与活力。

以网络新技术为载体的共享经济促使青年的生产潜能得到极大解放,“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8]</sup>网络空间与新技术的结合为人们进行数字生产提供了一个高度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平台,使人们把自身的生产成果从私人空间拓展到“赛伯空间”<sup>①</sup>,形成“生产—销售—消费”闭环的共享生产模式,实现了生产者、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原本链条式的生产模式让位于共享式的数字化生产系统,使大众同时成为网络空间的生产者与享有者,引发了全民参与的生产潮流。全民参与的生产模式为青年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职业空间,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多种工作角色的转换,职业拓展性极大增强,生产潜能与热情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也促使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加青睐隶属于“共享生产”的新兴岗位。《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的“大学生就业首选调查”结果显示,IT与通讯业是大

<sup>①</sup>“赛伯空间”由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2年发表于《Omni》杂志的短篇小说《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 Chrome)》中首次提出,指全球计算机网络化将人类、机器、信息源都联结起来的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虚拟空间。

学生就业的首选行业,其次是商贸业、金融保险业、电力石化能源、政府机关等<sup>[9]</sup>。从网络写手到视频博主、从网约车司机到共享单车猎人、从网店小二到新媒体运营者,这些标榜灵活、自由的职业将一部分青年转化为新一代数字劳动者<sup>[10]</sup>。多重角色的体验进一步激发了青年的创作热情,使他们的自由创作朝着个性化方向发展,依据个人喜好、兴趣、才能与风格,自主自觉地为世界“画像”,呈现出他们眼中独特的山川与风景、历史与人物、宇宙与人生。

## (二)“智慧化”社会治理机制推动青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解读世界多样性

新技术将社会治理的各个要素整合成智能化的发展机体,促使青年在高效的网络化治理环境中,以开放的视角认知与解读世界的多元差异。

新技术把社会的“核心公共职能、社会交流和个人信息都汇集在数字化平台上”<sup>[11]</sup>,打造成组织、管理、交往及生活融为一体的智慧化生长的社会有机体。以区块链、大数据等为技术载体建立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投入到智慧医疗、智慧能源、智慧物联网等领域,在社会建立起动态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每个网格都成为中心,网格之间彼此相互连接。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与运行转化为扁平化的共生生态,促使传统的城市“中心化”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城区与市郊出现融合混杂的发展变化,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成为使用者、分享者与消费者。智慧治理机制促使“一种激发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式正在浮现:它以网络为平台,采取分布式圈层组织,集合青年人的碎片时间,发挥青年人的专业优势,构建起彼此支持的网络”<sup>[12]</sup>,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新时尚。“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原有的核心空间和权威地位,推动青年在多元氛围中形成开放包容的价值取向。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13]</sup>以往强调中心、统一、标准的三维定势被打破,青年逐渐以开放、平等、多元的价值取向去解读世界的“不同”,接纳世界中存在的不同意见、主张和观念,寻求差异中的统一与和谐。

## (三)“自由休闲”的工作方式推动青年以合作共生的取向解读世界

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分工也产生了巨大变革。原有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作岗位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部分更高级的工作岗位也实现了人与技术的结合。青年作为当前国家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生产主力,必然受到新技术对工作领域产生的巨大冲击。

智能生产技术正为青年构建实现工作与休闲相统一的劳动模式,使青年能够在“自由休闲”的工作方式中实现自我发展。人工智能进入不同行业与领域,形成了一个由智能系统、智能AI构成的生产工业链,推动工业领域发生革命性转向,深刻改变社会分工格局。“无人”式的现代生产逐渐成为常态,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大部分工作岗位出现了让位于机器或与机器合作的趋势。青年的体力劳动、简单性思维劳动逐渐交给机器完成,由此获得了更多空闲时间,可以投入到更有价值、更能够体现人自身特性的工作上,如需要想象力、创造力、情感体验等要素的工作岗位。这种工作方式将工作与休闲娱乐融为一体,“主要不是出于人的谋生需要,而是基于人的兴趣爱好,因此不具有对人的强迫性”<sup>[14]</sup>,使青年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丰富发展自身,更利于他们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意味着,与机器合作会成为青年的工作核心,AI将成为青年提高工作效率、生活质量乃至提升自我能力的重要“帮手”。这一关系促使青年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宽广的视野,解读人与机器共生、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融的关系。

## 三、新技术搭建全新人文空间,提升青年改造世界的能力

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青年正处于抽象思维能力高度发展的形式运算阶段,而新技术为青年激活感性因素、获取多元价值、吸收丰富知识提供了广阔空间,进一步促进了青年想

象力、创造力与建构能力的充分发展,使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改造美好世界图景的实践之中。

### (一)虚拟实践解放青年的感性思维,唤醒他们对世界的想象能力

虚拟实践是青年“通过数字化中介系统在虚拟时空进行的主体与虚拟客体双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sup>[15]</sup>。在虚拟实践中,青年在感官感觉与网络、计算机的深度交互中,充分激活构想美好世界的潜力。

青年的感性能力在人机交互的虚拟实践中得到延伸和放大,感性思维得到进一步提升。马克思强调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sup>[16]</sup>。人类只有在实践中成为感性文化的创造主体,感性思维才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传感器、人工智能、三维打印等新技术的进步,为青年打造了一个手之所触、眼之所及、耳之所闻与鼻之所嗅的世界,促使他们在虚拟实践中“借助人—机的数字化的功能,将在历史中被弱化的感觉能力强化起来,使在工业文明中失去的感性能力得以复归,从而实现‘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感觉”<sup>[17]</sup>。感官刺激使青年的情感、直觉、想象、精神等各种非理性因素得到充分发展,打开了他们探索未知领域、规划未来生活的想象空间。这一变革使马尔库塞所描述的“不再有能力的追求,甚至不再有能力的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sup>[18]</sup>的“单向度的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想象能力、创造能力、预见能力的新一代人。虽然青年的非理性因素包含着正负两方面内容,但负面因素通过网络管控机制得到有效制约,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与想象能力的正面因素不断被唤醒,并通过智能化平台展现出来。

### (二)价值共享为青年提供思想养分,提高他们对世界的创造能力

新技术将人类的活动与交往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推动青年从整个人类世界中汲取有价值的知识、思想与观念,激活他们创造世界的潜能。

新技术搭建的数据共享平台使多元价值得以自由传递与共享,为青年提供丰富的创造灵感。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新技术以超大信息容量和智能交互平台,为人们的交往带来开放、自由与互动,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时空限制。人作为关系性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变革必然带来思想关系、价值关系的变化,最终在虚拟世界呈现为信息的差异与分化。“在现实性上,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作用发挥及其过程中的价值交流、碰撞乃至冲突等,都是网络空间存在的基本样态。”<sup>[19]</sup>民族、国家、文化、阶级的差别促使不同的声音、主张与价值观共存于虚拟世界中,而新技术所搭建的MCN模式(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将UGC(用户原创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聚合为一体,为每个人输出、输入、交流与共享价值观提供了巨大的运作平台,促使社会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化,价值观的交流、碰撞、冲突与交融更为频繁,也更为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秀,启发自己的思维。”<sup>[20]</sup>作为反映不同文明内核的价值观,也是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的深层源泉。不同文明背后的价值观为青年改造世界提供价值坐标、方法途径,使他们对世界的多要素整合创新成为可能。

### (三)智慧学习系统促进青年深度学习,增强他们对世界的建构能力

新技术打造的智慧学习系统为青年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和内容提供支撑,使青年的自主性、个性化学习得以拓展,在深度交互的学习中不断培养建构能力。

新技术构建“泛在式”的智慧学习系统为青年进行自主学习提供知识资源。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新技术背景下“教育4.0”全球框架,确定新兴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未来学校”模式<sup>[21]</sup>。在“未来学校”模式中,新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集AI对话、沉浸模式、元认知评价算法与虚拟图书馆网络于一体,为青年打造一个如MOOC等具有海量资源的交互学习平台,将学习模式以“教”为中心转

向以“学”为中心。“随着MOOC这类公开课的大面积推广,这种网络公开课形式,让知识不再存在于不同学校内部的孤岛碎片,而是能够在网络海洋中广为连接的整体”<sup>[22]</sup>,并且通过大数据追踪,向每位学生“靶标式”地推送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使学生自主获取学习资源、掌握学习方法、把控学习进度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学习的主导权回归到了青年学生,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热情被充分触发,自主探究与建构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充满主动性的自我学习让青年的“信息素养”<sup>①</sup>得到充分发展,掌握快速筛选、分类、整合与运用有效信息的技能,自觉在有兴趣与特长的领域中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充分培养科学探究与自主建构的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青年可以利用大数据了解社会的发展特点及趋势,理性思考世界发展问题,进而自主从智慧学习平台中积累丰富的知识信息,对世界发展做出前瞻性思考、预见性把握。

综上,青年的价值观形成是从认知内化、取向生成到实践外化不断深入的过程,每个过程的发展变化都得到新技术的赋能,促使青年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一方面,青年价值观呈现个性色彩与多元并存的样态。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习惯于自由成长、表达与行动的广阔空间,主体意识日趋增强。“‘自我表现’、‘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是‘90后’最凸显的群体特征,也是‘90后’最本质的群体特征。”<sup>[23]</sup>这种自主意识表现在他们追求个性张扬,更注重“标签”与“风格”的彰显,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青年亚文化如二次元文化、弹幕文化、电竞文化等是青年价值观偏向个性追求的直接体现。同时,平等、民主、共享的氛围又使青年形成了“存在即合理”的包容心态,开放、公平、公正等取向以及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更加突出,对多元态度、主张与价值的评价更为宽容。基于新技术对青年与世界之间的高度黏合作用,个性与包容两者看似截然相反的特性融合在了青年的价值观之中。另一方面,青年价值观呈现开拓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征。与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及随之带来的社会变革相适应,青年的风险意识、开拓精神更加强烈,并在新技术支撑下具有更强的创新底气与信心。他们能够快速适应技术更迭与社会变化,在生活、娱乐、工作等领域积极求新求变、敢于冒险。有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成为新职业从业者的主力军,占比超过90%,其中“90后”占据半壁江山<sup>[24]</sup>。此外,大学生创业与青年返乡创业也成为新的职业时尚,进取开拓的观念促使他们面向未来和世界挑战,寻找属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他们对创新不再停留于描述层面,而把创造创新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当代青年正以最灵敏的价值晴雨表刻画出新 技术时代的价值走向,以开拓进取、创新创造为主题的时代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 四、新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消极影响及教育引导

面对今日技术之变,人类将走向何方,不仅取决于新技术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更取决于人类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对待和运用新技术,而青年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新技术既为青年价值观形成赋能,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风险和挑战。就技术本身而言,隐含于技术中的资本逻辑及其“去中心化”特质渗透到青年的日常生活,影响着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从技术应用来看,青年沉溺于“智能生活”的现象日益普遍,致使他们滋生出技术崇拜的错误观念。因此,教育有必要与新技术研发运用以及青年价值观形成过程实现全面深度融合,

---

① 1989年,美国图书馆学会(ALA)给信息素养下了明确定义,即“一个人可以察觉到信息需求的产生,并具有获取、评估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引导青年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 (一)资本逻辑消解青年的主体理性,要求主导价值观引领新技术创造过程

青年的价值观形成不仅是社会环境与教育等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更是青年自主建构的过程,自主自觉的理性认知是价值观的形成基础。新技术虽然极大地延伸了青年的认知视野,但其带有的逐利本性又冲击着青年的主体理性,影响其正确价值观的生成。

新技术内在的资本逻辑通过算法操控诱导青年“积极”享乐与消费,带来消解理性认知的危机。技术的创新研发本身离不开资本的支撑,“现代技术,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形式,将技术与资本合二为一,形成合谋之势,呈现交叠状态”<sup>[25]</sup>,技术在促使资本推动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沦为了资本赚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新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应用范围之广以及使用效率之高,其背后的资本支撑功不可没,但也必然导致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对新技术进一步渗透,致使新技术的研发、设计与产生存在着求利与增值的价值偏向。算法作为技术呈现的计算机制,从根本上受到资本制约与操控,信息推送的资本导向扩散到青年群体中,导致青年认知世界的主体理性不断式微。从表面上看,智能技术所构建的个性化信息推送,其基本逻辑是最大限度地迎合和满足青年的爱好偏好。但是,“当青年长期习惯于这种定向化的信息推送,就有可能出现诸如‘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负效应,长此以往将造成其感官情绪对行为的驱动不断越过理性的深思,青年本有的理性反思与批判能力也会在这种个性化迎合中消磨殆尽。”<sup>[26]</sup>在理性迷失的情况下,青年往往无法理性认识与判断批判技术存在的逐利本性,潜移默化地以“积极消费者”的角色沦为资本附庸,而且极易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导向中形成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错误价值观。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的:“程序产业,在每一天,尤其是通过大众化的程序推送,生产了大量的‘人工群众’(artificial crowd)。”<sup>[27]</sup>以利益至上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成为信息内容的主流价值观,致使青年被生产成为技术背后的资本所期望的“人”。

价值观教育需要将主导价值观嵌入技术的研发与运用过程,重塑新技术生产的价值旨归,从源头上解决影响青年价值观的要素。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覆盖整个新技术生产领域,建构统一的价值原则、价值标准来衡量技术的合理性和目的性,明确发展新技术的目的不在于支配人的思想与价值,而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归宿。另一方面,培养技术领域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他们致力于健康向上的价值型技术开发,消解负向的价值偏见对新技术创造的影响。如此,才有助于实现技术成果“物用”之上真、善、美的统一,促使青年深入反思新技术生成的意图与价值,坚定以技术为辅助、以自我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立场。

### (二)“去中心化”特质造成青年价值迷茫,要求价值观教育筑牢新技术应用阵地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一旦出现价值迷茫,青年群体极易受不良价值诱导,因此,有必要警惕新技术“去中心化”特质造成主导价值“真空”的现象,对青年价值观形成消极作用。

新技术强化了虚拟空间与社会管理的“去中心化”导向,使青年表达意愿的潜能得到激发和提升,但也因遭受多元价值扰乱与主导价值消解而造成价值迷茫。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意图是通过透明开放的分布式账本形式,解决人与数据之间的信任问题,帮助人们跳出权威中心的领导,在去中心应用中获得自主权与共享权。“去中心化”的特质使得权威中心被弱化消解,却加速了网络“再中心化”的趋势,各种主张、立场争夺“中心”、建构“中心”,本质上都是通过争夺话语权以传导自身主张的价值观。新技术以新兴的“泛在”环境与“去中心化”管理模式,为青年构建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的二元世界,使得“青年可以通过数据生产及其相关性寻找潜在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将利益、价值观、需要相近的个体关联起来,从而产生赋权机制”<sup>[28]</sup>。青年可

以通过共同利益诉求自主凝聚一个意见“中心”,以保障自身的立场与权利,这极大地促进了青年的思想自觉性与实践积极性。但信息表达泛化不断消解主导价值观的中心格局,一切严肃性、权威性的话语效果被削弱,而不同派别的意见领袖对话语领导权、价值主导权的争夺则更加激烈,致使青年在充满剧情反转的冲突中陷入迷茫,难以坚定正确的价值认同,极易受新“中心”的引导和塑造,按其所期待的方向去“想什么”和“做什么”。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up>[29]</sup>无意识的行为发生正是价值迷茫所造成的从众反应,盲目的跟风、从众极易使青年形成错误取向甚至做出失范行为。

价值观教育需要筑牢新技术应用领域的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大主导价值观的优质内容供给,促进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一方面,构建主导价值观在新技术领域的精准化传播机制,不断拓展主导价值观在数据、算法与技术逻辑中的传播阵地;另一方面,运用新技术为青年提供丰富健康的高质量文化产品,让青年在网络生活中受到主导价值观的充分熏陶与感化,自觉运用主导价值观明辨舆论场中的是非对错。只有通过技术手段的先进性、便捷性及其承载内容的丰富性聚集青年,通过赋予技术价值性与思想性引导青年,才能推动价值观教育从课堂走向技术、从教学走向日常,引导青年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 (三)智能生活使青年形成技术崇拜倾向,要求价值观教育发挥人文精神引导作用

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技术崇拜”意识正极度扩张与蔓延。青年日益将问题难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技术,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强化,作为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力则不断被侵蚀,最终削弱了价值践行的效果。

新技术所构建的智能生活已经渗透到青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领域,青年的技术依赖性日益增强。“人工智能”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广泛,智能手机、智能软件等服务载体已经成为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选择。有调查发现,青年群体中有94%的人表示,出门不带手机感到很习惯,86.8%的人无法适应从智能手机换到普通手机,73%的人通常每隔15分钟至少看一次微信、QQ等社交软件<sup>[30]</sup>。凭借智能服务带来的享乐、自由、快意,尤其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不断实现人体肉身与技术的直接结合,致使青年深陷技术所构成的数字化世界中不能自拔,以现实世界的“缺场”为代价延长虚拟世界的“在场”时间,逐渐从“沉浸”体验转向“成瘾”体验。智能服务给青年带来的需要满足越广泛,青年的依赖程度越强,越容易沉迷技术而忽视现实的生活实践。“凭借着科学技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然而自由之得同时亦是自由之失,我们依靠科学技术获取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也就同时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项技术。”<sup>[31]</sup>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解决,一切财富、利益甚至情感需要都可以通过技术获得的新方式,推动青年将原本对自我能力的信任寄托于技术,形成技术能力至上、一切依靠技术的崇拜心理,在享受工具理性带来的快感中遗忘了现实实践对自我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在“当下”生活以技术角色呈现、与机器对话为主要形式时,青年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应具有的交往感知、情感情绪、文化滋润就会逐渐被剥夺,现实世界所具有的真实感与丰富性逐渐丧失,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现实关切与实践动力必然随之削弱。

价值观教育需要用人文理想、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呼唤青年对现实幸福的理解,引导青年的关注焦点从技术回归人与现实自身,塑造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丰盈青年的人文底蕴和道德素养,教导他们立足人性,辨别技术的积极作用与弊端,确立技术作为生命发展工具的价值思维,回到现实生活中追求“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sup>[32]</sup>的发展理想。另一方面,深入青年的内心世界,关注青年在新技术平台上的生活及心理状态,借助新技术平台挖掘青年热爱的新文化资源,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流文化进行融合创新,为青年的新世界注入新的人文趣味,引导青年在虚拟与现实、技术与自我

的交替之间,以主体性、现实性的实践活动启发对真善美的追求。

总之,新技术赋能使当代青年的认知广度、价值取向及实践潜能“一日千里”,使他们在认知世界、解读世界与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价值特征,但新技术对青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同样明显。因此,深入探讨新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当前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仅从技术或社会层面简单认识正在变革世界的新技术,而要洞见新技术之于青年价值观的深刻再塑,深入挖掘新技术背景下青年的发展旨趣及其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大批从容驾驭科技之势、把握时代之脉、担当历史之责的时代新人,不断积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坚力量。

### [参考文献]

- [1]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 [2] 肖 峰:《技术哲学视野中的青年及其认知特征》,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9期。
- [3][28] 方 俊 蒋 艳:《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4] 肖 峰:《从互联网到物联网:技术哲学的新探索》,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5] 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页。
- [6] 周若辉:《虚拟与现实——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方式》,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 [7] 张明仓:《虚拟实践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 [8] 《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 [9] 朱白薇 郑永廷:《论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基本特征》,载《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7期。
- [10] 王 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 [11]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李 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 [12] 施芸卿:《为社区治理汇聚青年力量(新论)》,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8日。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 [14] 肖 峰:《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含义的哲学探析——兼论“软工作”的意义与“工作哲学”的兴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 [15] 孙伟平:《论虚拟实践的哲学意蕴》,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9期。
- [16][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189页。
- [17] 齐 鹏:《论网络时代的感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1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 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2页。
- [19] 陈宗章:《网络信息的价值生态及其建构》,载《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0期。
- [20]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 [21] 王永固 许家奇 等:《教育4.0全球框架:未来学校教育与模式转变——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学校: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之报告解读》,载《远程教育杂志》,2020年第3期。
- [22] 刘 涛:《互联网+时代大变革:社会重构、企业再造与个人重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 [23] 邓希泉:《“90后”新价值观研究》,载《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9期。
- [24] 王烨捷:《新兴职业打开青年成长新空间》,载《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11日。
- [25] 王治东 曹 思:《资本逻辑视阈下的技术与正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2期。
- [26] 汪 康 吴学琴:《智能媒体时代青年价值观认同建构》,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 [27] 斯蒂格勒:《南京课程:从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张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 [30] 朱 迪 何炜金 等:《生活在此处——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页。
- [31]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33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